

# 文艺创作中的价值选择

□马建辉

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大变革,一些人的价值立场散乱游移,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态势。从一定意义上说,文艺创作是一种价值选择活动,它对价值观念发展态势极为敏感,可以说,价值观念存在形态有多复杂,文艺在这方面的呈现就会有多复杂。然而,优秀的文艺作品不应只是作家个人的游戏或读者闲暇时的消遣,“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作为国民精神的重要构建形式,它不应是自在的写作,而应是自为的写作。文艺创作有责任不为多元、多样、多变所惑,守望国民精神,坚持核心价值,以总体性、本性、主流性反映为主,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稳立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思想支撑,凝聚精神力量,引领价值朝向。

我们知道,美国很多根据小说改编的当代大片都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围绕美国的核心价值来表现,核心价值在这些影片中得到了非常清晰的展示。美国大片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人性”和“人权”,体现“人性”、维护“人权”是其基本色调,抽象的、个体属性的人性和人权构成了其艺术作品表现的主旋律。在表现主旋律价值方面,美国的文艺作品实际上显得不那么多样和多元;少数民族文艺、女权主义文艺、后现代文艺,在这些“多元”表象中,那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不缺席。近几十年来,美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迅速并受到学界和大众的广泛认可,由此,如何把“多元”文化纳入到“一元”的美国文化当中去、如何把美国形象的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联系起来,就成了美国文学批评与文化事业关注的焦点之一。可见,美国的包括文艺创作在内的文化事业为美国核心价值的构建、维护和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就是美国文艺创作的主旋律,也是其文艺创作的责任感的一部分。

如果与美国文艺作品中的核心价值相对应来看的话,我国的核心价值落实到文艺作品中,就应该是人民性和人民权利,要体现人民性,维护人民权利,具体的、集体属性的人民性和人民权利应该成为我们文艺作品表现的主旋律。我们重视人民,强调集体;同时,我们也不忽视个体,不忽视个体的价值诉求,不忽视差异性,因此,我们还强调多样化。但如果我们决心要维护我们的

核心价值,形成区别的文化存在模式,形成真正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话,主旋律价值就必须加强,多样必须在与主旋律的协同中实现其多样,而不能以多样排斥主旋律。主旋律强调的要点在价值选择维度,而非涉及创作的素材题材、技巧手法等方面。“百花齐放春满园”,这里的主旋律,不是指哪一朵或哪一类花,而是指春天,“百花齐放”合奏出的是春的主旋律。

这里要说到部分研究者提的较多的文学创作中的歌颂和批判的倾向问题,这两种倾向可以有不同的价值选择,也可以有相同的价值选择。这就意味着歌颂性作品可以是主旋律作品,批判性作品也可以是主旋律作品。站在人民立场的批判性作品也可以是主旋律作品,而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的或虚假假意的歌颂性作品未必是主旋律作品。歌颂性和批判性是文学的写作倾向,并非主旋律作品的分界准则,主旋律可以有歌颂性主旋律作品,也可以有批判性主旋律作品。近来不断涌现的描写基层社会状况的“底层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带有鲜明的现实批判精神,在我看来,这些同样应是主旋律作品。判断是否主旋律的标尺应该是是否有利于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在建构核心价值过程中,我们需要肯定,正像人的成长需要营养品一样;但我们同时也需要批判,正像人有时生病会需要吃药一样。有些作家出于各种原因看不起歌颂性作品,这是个认识上的误区。颂歌写得好,同样可以入木三分、感天动地。现实生活中,体现我们的核心价值的最美教师张丽莉、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北川县副县长兰辉,这些人物走进文学作品,就会形成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展现中国精神,使我们的核心价值充满吸引力。面临灾难,难道不可以写颂歌吗?《泰坦尼克号》(2012)都是灾难片,但却都是对于崇高人性的礼赞。我国报道唐山大地震、北京非典、汶川大地震、雅安地震的那些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也都是直面灾难的赞歌。使人们在灾难中振作起来,看到希望,那些对优美人性、坚定意志、乐观态度的颂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批判性文艺作品,同样需要以主旋律的价值建构为重要遵循。鲁迅对于民众,无疑有着深刻的国民性批判(包括对形成这种国民性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批判),但其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更不是为了展览丑陋。

引起蔑视和嗤笑,而是为了改造,为了“立人”,为了唤醒民众,启发民智,发挥民众力量来改造社会,开辟新路,创造历史,创造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新生活。同时,鲁迅对于人民大众的基本品质和根本精神又是充分肯定的,他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显然,这就要求文艺家不仅要有启蒙民众的睿智,更要有“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的勇气。既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概,又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鲁迅为了“不主张消极”,“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而在他的另一篇小说《一件小事》中,则是通过自我批判来赞颂普通劳动者的美德。可见,鲁迅的批判里充满着肯定的力量,从其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对旧价值的解构,更有对新价值的建设。核心价值的消解不只是思想领域的问题,社会现实中的不良现象同样对消解核心价值有着很大的推动,有时甚至是更重要的推动力量,这时,对这些不良现象的批判就是对核心价值的维护和构建,这样的文艺作品和正面肯定核心价值的歌颂性作品发挥着同样的功能,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说批判性文艺作品可以是主旋律作品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说过,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才产生出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或程度上说,文艺家想让读者成为什么样,就怎样创作;想在读者中塑造什么样的价值观,就在作品中进行怎样的价值选择。“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乐本心术,故响淡肌髓”(刘勰《文心雕龙》)。用善来激发善念,用美来培育美感,正是文艺活动的重要旨归。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证,由于沉湎表现色情暴力的影视或文学作品,使一些青少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激励、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奋发进取、励志图强。“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用文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用主旋律构建核心价值,是我们这个多元、多样、多变的思想时代的基本要求。在价值选择上,我们当然不用去刻意回避困惑、迷茫和彷徨,但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清醒、明晰和坚定。

刘大白是“五四”时期的著名作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现代文学史讲到“五四”时期,都会提到他,但又往往言之不详,或者囿于历史成见未能给他以客观公允的和全面的评介。至今,真正下功夫去研究刘大白的人并不多。新近出版的刘家思的《刘大白评传》(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以下简称《评传》),是“五四”作家研究的创新之作,经过作者深入细致的钻研,取得可喜成果,把我们对刘大白的认识推进了一大步。

刘大白是个具有思想复杂性的人物,不仅人生经历是复杂的,其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以往现代文学研究中,只是把刘大白定位为初期白话诗人,而对他的诗歌又往往只肯定《红色的新年》《卖布谣》这一类政治抒情诗和歌唱底层人民的叙事诗,这是很不全面的。刘家思的《评传》对刘大白做了系统的、全面的研究,还原其历史的真实面貌。从中我们看到刘大白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位重要开拓者,他还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民主革命的先驱者、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国学根基深厚的著名学者。他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曾膺膺拔贡。1896年便已踏上文学道路,形成了自己的文艺观,开始了诗歌创作,古典诗词与白话诗俱佳。1897年从教,相继担任中小学和大学教师,并在大学任系主任、秘书长等。1905年加入光复会,踏上革命道路,与其他几位革命者并称绍兴“三杰”和“四君子”。“二次革命”失败后避难海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积极宣传新文化,提倡新文学,当时是著名的“浙江四杰”、浙江文坛“三叛徒”、浙江一师“四大金刚”之一。他还是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曾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组织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进步团体悟社和革命组织社,不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和中共浙江省杭州党小组在其寓所诞生,还参与组织衙前农民运动;1924年国共合作期间,他信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当时许多中共党员一样,加入了国民党,主张国共合作,推动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教育事业。大革命失败后,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政治信仰和理想追求,他应蒋梦麟的邀请,1927年5月起任浙江省教育厅秘书,1929年起又任国家教育部常任次长、政务次长,并代理部务数月,以期践行民权,健全治权,教育和唤醒民众,促进民主共和,推进民主革命。《评传》以翔实的史料、精到的评述,还原了刘大白的真实人生,展现了他在现代革命史、文化史、文学史、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填补了刘大白研究中遗漏的许多空白。毫无疑问,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收获。

为了把历史的叙述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作者曾在国内外几十家图书馆、档案馆和纪念馆搜寻、发掘,收获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对这些史料进行鉴别、整理,把文献考据与理论分析结合起来,使得过去流传的关于刘大白逃婚、出家、少年拔贡、红衣女郎等一系列错误传说得到了纠正,也对他加入光复会、退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国民党、入阁教育部以及与蒋介石的关系等众多模糊不清的史实得到了辨正;而且对他为什么从反体制的革命阵营走向体制内而最后又逃离出来,以及为什么不管命运的悲喜沉浮都不放弃文学和学术等问题作出了独到的解答,这些都是本书的重要学术价值所在。

《评传》不仅在阐述刘大白真实人生的完备性上具有开创性,同时也很重视立体地展现刘大白的精神世界特征,系统论述了刘大白反封建意识的生成,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记述并分析他如何接受“无政府共产主义”,追求马克思主义,又信仰三民主义,还研习过佛家理论。对传主性格特征的探问也相当重视,深入总结了刘大白刚强勇猛,敢于担当、不怕牺牲、友善泛爱、廉洁奉公、孤独寂寞地甘居幕后的主体性格及对其人生道路的影响。所有这些,都置之于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研究,运用系统论观念,融社会批评、文化剖析与主体批评于一体,多维度地对传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生状况、卓越成就与诸多贡献予以整体梳理、把握和评价。从而揭示了刘大白从一位封建科举士子转变为新文化运动和政治革命先驱者的心路历程及其主观原因;又从这一具体的个案揭示其所蕴含的典型性和普遍性,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近代知识分子走向现代的精神轨迹,其学术意义超越了作家研究本身。诚可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教育、学术与革命史的研究提供参考,又能烛照知识分子的现实人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在评介刘大白的文学贡献方面,《评传》也有不少突破性的成果。人们看到刘大白堪称文体家,虽以旧文学步入文坛,却愧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诗歌充分地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政治风云的变幻,热切地关注世态,表现了强烈的革命理想,显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审美取向。他不仅有历来为人称道的红色抒情诗和底层人民生活叙事诗,还有爱情诗、哲理诗、写景诗、儿童诗等,都为现代白话新诗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又是现代散文(杂文)的开创者之一,最初的散文发表在《绍兴公报》上,“五四”时期以白话杂文形式影响,之后以小品文和政论文为主,其强烈的现实指向、犀利的笔锋、鲜明的思想、亮丽的表达以及独特的文体形态,显示了他非凡的创造力,对新文学的创建产生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作者收集、研究了几百篇他的散文,对于研究刘大白和现代文学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刘家思的这部《评传》没有把刘大白仅仅作为一个初期白话诗的作者看待,他为一位作家写评传,却非局限于文学领域的论述,而是全面地介绍、分析、评论刘大白,考察其生平,从他多方面的思想、事迹和经历中对人物做总体的分析,刀锋所及,达到一定的深度。经过这样一番观照,回过头来再看人物的文学成就,再来解读那些作品,便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这在作家评论的方法上也给人很多启发。

——评刘家思的《刘大白评传》

□黄修己

# 「五四」作家研究的可喜收获

## 一份独特的茅盾文学奖作品档案

□白烨

根据中国作协原主席茅盾生前捐赠的25万元稿费和“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的最终遗嘱,中国作家协会于1981年3月设立的茅盾文学奖,已连续举办了八届,先后表彰了1977—2010年间的38部长篇小说。这个奖项从举办以来,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议论,比如,哪些是不该获奖的奖了,哪些是本该获奖的又未获奖,等等。但是,回望这八届茅奖评选及获奖作品,平心而论,它还是在众多的作品中优中选优的方式,遴选出了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比较好地反映了长篇小说30年来的长足崛起。

去年,中国作家莫言荣获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喜讯从瑞典文学院传来,人们奔走相告,文坛一片欢腾。而正是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他的长篇小说《蛙》经过几轮激烈竞争,最终荣获此奖。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作为中国长篇小说最为重要的奖项,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在优秀作品的遴选上,确是有眼光,也是有预见的。

在我国当代文学的所有奖项之中,以长篇小说为表彰对象的茅盾文学奖,创办的时间最早,举办的年头最长,在文坛内外的影响也最大。但与此不相适应

的是,有关这一奖项的史料收集、文本解读与宏观考察等,关注的人不多,研究的也很不够,更谈不上细致与全面。这使得人们要想了解茅盾文学奖的有关状况时,就只能翻阅一些散见于纸媒与网络的各种文字与资料,而即使如中国作协的“中国作家网”的“茅盾文学奖”专题,也主要是获奖作品目录,别的资讯一概没有。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廖四平的这本《当代长篇小说的星座——第一至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丛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就显出了它的非同一般的及时与重要,有了这本专论,有关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评述与研究,就不再是一个空白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选题既适逢其时,又独步一时,堪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枚妙棋。

当然,廖四平的这部研读茅奖作品的《当代长篇小说的星座——第一至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丛论》,不独以选题的补弱弥缺与角度的先人一步而取胜,它在基本内容构成的两个大的方面,还有着其显而易见的优长与值得关注的意义。

其一,是由具体评介与系统扫描构成了一份独特的茅奖作品基本档案。

茅奖自1982年起评奖,连续评选了八届,涉及30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而不同时期的作品创作,又与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社会脉动密切相连。作品背后又有一定的文学活动支撑,文学背后又有一定的社会生活依托。因此,看起来只是一個文学奖项的茅盾文学奖,其蕴有的内涵与意义,实际上远远地超出了一个文学奖。廖四平在他的这本论著里,从第一届到第七届(只缺最新的一届),对茅奖获奖作品依次进行评介,既有较为精细的逐个作品的评述,介绍了每届获奖作品的各自特色,又有顺流而来的依届评述,在整体上描述出了茅奖评选的整体演进。在这里,具体来看,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风景,不同作品有不同作品的样貌,但总体来看,又有茅奖自身发展演进及其标志的长篇小说的强力行进与一路高歌的基本态势。这种横向上有具体的作品评介,纵向上又有总体的发展的情形,使得这部论著在对茅奖作品的评述上,除去其既有的评论性、学理性之外,显然还有一种充足的档案性,乃至一种难得的史活性。

其二,是由文本细读与资讯引述构成了一个丰盈的名作大观与茅奖总览。

《当代长篇小说的星座——第一至

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从论》在对第一届至第七届的茅奖获奖作品进行具体评述时,既寻绎其在题旨与内容上的自我发现,又探悉其在艺术形式上的独特创意,力求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两个方面,客观而全面地掘现获奖作品品种的特色与特点。而且,在评述每部作品时,还引述了获奖作品作者的创作谈,征引了大量的相关的评论意见与研究文字,这使得这部著述在阐释论者自己的研究心得的同时,还别有一种茅奖作品评论与研究之集大成的意味。这种既囊括了廖四平自己文本解读的所得,又包含了别的研究者不同时期的即时评论的丰富而多样的内容构成,使得这部论著,成为名副其实的茅奖获奖作品的名作大观与茅奖总览,从而给不同层次的读者和不同需要的阅读,都提供了应用的要点与应有的方便。

廖四平这部论著,对于文学领域里的人来说,可作为一部有关茅奖的档案性质的工具书,可备于手边,随时查阅查看;而对于文学领域以外的人来说,则可作为一部有关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大观与文本导读,可由此了解茅盾文学奖的代表性作品及其评奖以来的大致脉络。

## 张江舟水墨艺术展在西安展出

江舟的艺术成就与笔墨思想。张江舟作为当代人物画领域的重要代表,以自己大胆的笔墨实践和积极的学术作为,身体力行地推动着中国当代美术的创作实践和繁荣发展。“生命·墨语”系列作品以映衬时代的中国式水墨,深入到生命本体与切肤之痛中表现主

题,让每一位观众都清楚地感受和意识到自身在当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境遇。“生命·墨语”在主题关切上的新视角和语言方式上的新形态,带领人们抵达灵魂深处,回到曾经失落的精神家园。

(欣闻)

## 科学、文化与人经典文丛:科普作品需要人文情怀

本报讯 由中国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和科学普及出版社主办的“科学、文化与人经典文丛”(金涛、郭曰方卷)作品研讨会在10月21日在京举行。专家学者围绕“今天这个时代如何书写科学”等话题展开热议。他们认为,人文情怀是科普作品的长久生命力所在。科普创作不仅仅是知识加技巧,更是创作者思想内涵和人文素养的体现。而这样的作品在科普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科学、文化与人经典文丛”的作者们不仅在作品中展现了他们理性的思维、渊博的学识,也融入了丰富的阅历和细腻的感情,知识性、哲理性和深刻的人文关怀贯穿始终,体现了科普作家对人类与自然、科学与文明、现实与未来的思考。(黎华)

## “品尚书系”出版

本报讯 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随笔文丛“品尚书系”日前出版,文丛共计6本,包括张颐武的《中国梦的世纪》、解玺璋的《五味书》、谢有顺的《消夏集》、李少君的《文化的附加值》、谭旭东的《我的书生活》、朱家雄的《未名湖畔的青春》。作者既有评论家、学者,也有作家、诗人,其中固然有严格意义上的随笔,也涵盖了评论、散文、演讲稿等,使这套书更轻松、活泼、自由。“品尚书系”以探讨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既精彩纷呈又五味俱全的文学、文化及文艺为重心,在充分尊重各位作者的思想趣味与文学理念的基础上,力图尽可能全面、生动、立体地展现各位作者的精神风采与人文底蕴。

这6部自选集既包括文学文艺评论、学术见解,又选录个人生活感悟、人生思考等。观点新颖而独特,语言风格各有千秋。该文丛主编朱家雄希望通过努力促进文学格局的多元化发展,为新世纪文学的大发展和文学界的中国梦作出贡献。他表示将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作为书系的立场,继续出版系列丛书。(欣闻)

## “世界的壳——徐累个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世界的壳——徐累个展”10月20日至29日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贺敬之发来贺信,祝贺和勉励获奖诗人再接再厉,为伟大时代写出更多优秀作品。石英、石祥、峭岩、朱先树、郭曰方5位诗人获奖。评奖活动由华夏新诗研究会、中华诗歌文学会、中国萧军研究会、《新国风》诗刊共同主办,80余人参加了颁奖典礼,同时

探讨新时期诗歌的社会责任与担当。会上,石祥、峭岩、朱先树先后发言,以诗人的胸怀谈生活、谈创作。他们认为,诗人和诗都生活在具体可感的时代中,诗人以个性化的方式对时代、社会、现实、人生进行诗意的感悟与表达,成为传递美好情感的可能。面对新的时代,诗人们要以诗的火光探寻诗路,点亮灵魂,照耀生活。(欣闻)

本报讯 作家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情人》近日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和盛世新华文化传媒体公司联合出版。《情人》原名《东方的故事》,创作并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此次推出的《情人》是修订版。这是柯云路长篇小说创作中第一部以女性为主主人公的作品,描写了女性情爱朦胧的觉醒,展示了爱情与性的关系,爱情与文化的相互影响,故事感人至深。(张雪婧)